

传统孝道的现代境遇与价值

肖群忠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的确，孝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孝经》是儒家的十三经之一，按《孝经》的说法，孝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一切教化与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孝与忠，它们比“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还要重要。

孝为什么在传统中国社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中国，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血缘联系非常紧密，使中国传统社会体现出一种家国同构的特点。而孝在周代大兴时，本身就是一种合血缘亲情与家族政治为一体的观念，例如，孝在周代其“善事父母”的意思实际上还并不那么突出，而主要是一种“尊祖敬宗”的宗族道德，在当时家天下的时代，这种尊祖敬宗本身就能起到“和睦九族”、加强家天下政治团结的功能。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家国同构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孝这种道德，如孟子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孝为仁之

本”。按我的理解，“孝为仁之本”不仅是指孝为实践仁的根本，而且是说，仁就是从这种爱敬亲长的感情中升华产生出来的。总之，孝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确是首德，甚至有时被泛化为一切道德。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想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本文想探讨的是，在传统社会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观念与首要道德，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却处于一种并不受重视而且长期受到批判的境遇。近年来，孝的问题又再次引起普遍关注，在当前我们重视传统文化，想把新道德建设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时候，究竟应如何看待孝的当代价值呢？

随着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在近代，孝道已经处于一种被怀疑批判、徘徊复古的情形，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孝道更是受到激烈的批判。通观五四时期对孝道的批判，其内容主要包含如下几方面：

第一，认为孝是封建专制的精神基础。孝通过以服从、听话、顺民的精神移孝作忠，扮演着维护以家国一体、家长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与家族制度联系之根

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

第二,认为孝极大地压抑和剥夺了子辈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是不平等基础上的奴隶道德,是吃人的礼教,因而要“救救孩子”,解放孩子。

第三,具体深入地批判了孝道与孝行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其残酷性就在于它不仅要从精神上牺牲子辈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而且还要从肉体上牺牲甚至消灭子辈。如割股疗亲,那是挖子辈的肉治父辈的疾;卧冰求鲤,那是以子辈的生命之虞换取父母的口腹之欲;而郭巨埋儿则直接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子辈了。其保守性在于孝道之祖先崇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一种崇古保守取向,是一种长者本位思想,不符合生命进化之规律,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其虚伪性在于泛孝主义的流弊以及以政治等各种手段过分强调孝,从而使孝道形成了种种不近人情、做戏、装面子的虚伪性:如老莱子之

“诈跌”、丧礼之逢吊客才哭而非“哀至则哭”等等,不一而足。

在1919~1949年的30年间,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但民众对孝道仍然有观念上的认同和实践上的践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仍然严格遵守孝行规范;在社会交往中,仍然保持孝道尊严、长长的礼治秩序和道德精神。由于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革,仍然是以家族作为社会的基础,加之儒学文化几千年的深刻积淀,在民众中,特别是广大而落后的农村,人们仍然继承弘扬着传统孝道。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儒学从此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神灵,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儒学开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加以研究、探讨、改造和利用。

1949~1955年间,新中国刚刚建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实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使社会和国家还无暇顾及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因而尚无或较少讨论孝道的文献。到了1956年,经过几年的社会变革,在家庭关系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所有制的改变,使过去的老年人的家长制、老养小,在某些家庭里,成了年轻人养活老年人,年轻人当家做主,有些年轻人随之产生了赡养父母是负担和累赘的想法,甚至认为父母不劳动,靠自己养活是“剥削自己”。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出现了有的青年虐待遗弃父母的行为,以至许多老人说“新社会样样都好,就是不分大小,不管爹娘”。针



仲由为亲负米



惨啗指痛心

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从1956年第20期开始,先后发表了《你怎样对待父母》(20期)、《从“孝”谈到怎样对待父母》(21期)、社论《不许虐待、遗弃父母亲》(23期)以及冯定的《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朱伯昆《尊敬和赡养父母是我国人民优良的道德传统》(24期)等文章;《光明日报》1956年7月27日也以“尊老爱幼”为主题发表了社论,批评了虐待和遗弃老人、子女的行为,呼吁“提倡尊老爱幼的家庭关系和社会风气”。有学者认为,“为了家庭生活过得美满愉快,父母的‘慈’固然必要,子女的‘孝’怕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实不能简单地把‘孝’看做‘封建’”。《人民日报》1957年1月12日发表了俞杞浩《何必不敢言“孝”》一文,针对前述《中国青年》、《光明日报》等批评的不孝的情形,提出亲子关系不同于老幼关系,不应把“孝”这个道德范畴让给封建主义去独占,而应提倡社会主义的“孝”!

综观这一时期围绕孝道问题的讨论,从总体上看,就是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这一总的原则和方法指导下,批判了传统孝道为封建统治服务和压抑晚辈个性成长、

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性,批判继承了作为人类自然亲情关系上的孝敬父母的合理因素。

1962~1965年,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儒学研究和道德继承性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包括孝道可以批判继承,这种观点以吴晗先生为主要代表,他连续发表了《论道德》、《再论道德》等重要文章,提出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包括孝道)可以批判继承的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关于道德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另一种意见片面扩大孝道等传统道德的阶级性、时代性,并将之与人民性、民族文化性尖锐对立起来,认为对传统忠孝道德必须“坚决摒弃”、“彻底决裂”、“彻底埋葬,绝不能继承”。由于认识上的简单化、教条化,再加上后来错误地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批判,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完全否定了孝道的合理性和继承性,再也没有人敢为传统道德(孝道)张目了。

1966~1976年的十年动乱,儒学遭到空前的厄运。从1966年开始,儒学经典被当作封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批判,70年代又开展了“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运动,儒学被全面否定。在这场民族灾难中,孔子和儒学,成了某种现实斗争、政治需要的替罪羊。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孝”似乎成了一个禁语,成为一个批判人的反义词,如说某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口号下,社会文化鼓励年轻人与父母划清界限,鼓励与传统观念决裂,鼓励年轻人造老子的反,上台揭发、打骂正被残酷批斗的父母;甚至父母

因受尽迫害身死，儿女也得上台踢尸体几脚等，人伦丧尽。可以说，这10年是中华传统孝道再次受到社会主流文化严重冲击和破坏的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儒学研究再度复兴，道德继承性问题又被学术界重提，传统孝道又重新被以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对待之。但在1983年以前，仍是被作为整个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例证加以讨论的，尚无讨论孝道的专文。

1983年，严北溟教授在《中国老人》杂志上发表了《今天还应不应该谈“孝”？》一文，再次引发了关于孝道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孝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美德”，“应该大谈而特谈”。这次讨论，虽有少数学者仍主张“不应该谈孝”、“孔子的‘孝’不应该继承”；但是多数学者在正本清源之后，认为包括孝在内的儒家传统道德具有二重性，应该在抛弃封建糟粕的同时，继承和弘扬孝道中的合理思想，为建设现代社会精神文明服务。这之后，专门探讨研究孝道的论文渐渐多起来了。在社会实践层面，国家教育部在制定中、小学生守则的过程中，围绕该不该写进“孝敬父母”的问题，最初意见也不尽一致，后来经过讨论，还是写进了这一条，并相应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开展了这方面的教育。

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进步，国家对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视，社会文化对孝道的肯定、继承和弘扬更为广泛深入了。有的同志肯定“现时期‘孝’的合理因素”，有的倡导“在全社会树立‘孝道’观念”，认为树立“孝道”观念是迎接我国超前性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增加家

庭养老承受力的需要，是建立正常的家庭代际关系、在家庭中落实尊老敬老风尚的需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道德规范体系的需要。有的同志提出了《建立现代社会新孝道的思考》，认为“新孝道”要具有如下特点：体现义务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主张互益性。

在社会文化的教化层面，有人在1997年初曾预言：目前一个跨世纪的“孝心工程”已在不少地方启动。山东济南一中、浙江东阳二中、上海二中等学校还把孝敬父母作为一门课程，规定父母生日、“三八”妇女节及每周末为学生“孝敬日”，培养学生爱父母、爱家庭、爱他人的道德品质。南京市教委则将每年的重阳节定为“中小学生学习孝敬日”，并列为全市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甚至还有报纸报道，南方某村又重塑二十四孝人物故事于村头，作为道德教育的活教材，真令人感到有矫枉过正之嫌。不过，社会文化对传统孝道的肯定与弘扬可见一斑。

从民众实践与孝行的角度看，1949年后的当代中国，也体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失德的矛盾情形。但从总体看，笔者以为继承弘扬占主导地位，这首先是由于孝道的文化传统在民间有广泛而深厚的积淀，甚至可以说渗透到了民族的血液中了，加之50年代对孝敬父母的肯定，建立社会主义新道德也要求人们尊老爱幼。十年浩劫时期，批斗、打骂父母的造反青年，毕竟是少数，仍有不少青年恪守人伦，奉行孝道。在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往往浩劫也波及不深，人们的家庭生活依然遵循着亲亲、尊尊、长长的传统孝道。1979年以后，

随着社会变革,核心家庭与独生子女的增多,在亲子关系上出现了以孩子为中心、小辈依赖老辈的现象,在家庭结构上,也出现了夫妻中心取代父子中心的变化,因此,在孝道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养不敬、遗弃、虐待甚至杀死父母的不孝行为。但笔者认为,从全社会的整体看,这些不孝行为均是个别而非普遍现象,报纸等传媒时而揭露这些不孝之举,本身就说明孝道在大多数人心中仍是有地位的,弘扬孝道仍受到大多数人的心理支持与重视,大多数人也是躬行孝道的。

从以上论述可见,作为我国传统道德核心和特色的孝道,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呈现出被批判和被弘扬、被践履与被抛弃两种并存的矛盾情形。之所以有这样的命运,首先是因为传统孝道本身含有阶级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民主性的双重性质,是精华与糟粕的混合体。其次,孝毕竟是传统社会的核心和首要道德,在现代中国,支撑这一道德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要把它简单地、原封不动地全部搬到现代社会中来也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孝的上述命运是由现代中国社会状况客观决定的。

近年来,孝道问题再次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引起争论的社会新闻事件也不少。比如,华中理工大学为了对大一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为他们布置了一项暑假家庭作业,就是要求学生回家后给父母洗一次脚。支持的认为这是思想教育的新举措,必将起到良好作用;而反对的则认为这有点做秀、虚伪。还有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就是四川有一位律师叫李宗发,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上书提出建议,

要求专门立一项地方法规即孝法,还提出要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考察、录用公务员的先决条件,从而引起了社会关注与讨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就此问题制作了一期谈话节目,让笔者就此问题谈看法,山东电视台还曾约请我与李律师等在“齐鲁开讲”节目中展开辩论。从现场观众打分来看,支持李律师的观点居多。另外,也有好多有识之士,对近年来农村孝道与城市孝道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有的还专门成立“中华慈孝文化推动委员会”,力求弘扬中华传统孝道文化,推动社会主义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孝道文化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社会提倡传统美德,那么,孝仍然会被中国广大老百姓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与价值?我个人的基本观点是,既要努力弘扬其合理因素,也要保持科学的理性态度,避免盲目性。

首先,孝道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不大可能也不再能够成为传统社会那样的首德地位。因为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变了,社会不再是家族社会,而是公民社会;我们不再是子民或臣民,而是公民。我们不仅要在家里对父母尽孝,而且要对社会、团体、人民、国家尽忠、持敬、尽责。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孝泛化了,似乎孝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让孝回到其家庭道德的本来和应有的地位,其合理性就是在家孝敬父母,但同时在社会上要尽职尽责,这两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要避免以孝代替一切,比如能当孝子未必是一个好官。现代公务员要有其相应的技术性训练、专业

性知识以及管理能力,我们不能再以古代的“举孝廉”的形式来选官,也不能再有“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思想。试想,党的好干部孔繁森远离山东的父母去西藏工作,一心为西藏人民服务,他是一个好干部,但未必是一个孝子;而一些贪赃枉法的贪官,其犯罪动机也往往是抵不住亲人、家人的情感诱惑。总之,在现代社会,公域与私域应分清楚,孝的合理性只能是在家庭之内的亲情关系中,不要再将它政治性泛化。

其次,在现代社会,弘扬孝道有利于家庭亲子关系的和谐,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现代中国社会,虽然人们的生产、交往活动的很大部分已经不再集中于家庭之内,但家庭关系与家庭生活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单位,现代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仍然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庭情结,亲子关系的和谐价值仍然为人们所珍视。虽然现代亲子关系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虽然也要倡导父母应慈爱子女,但仍然要大力提倡孝这一传统美德的合理内核,即要孝敬父母。我们要在道德建设过程中,通过学校、单位、社会等各种途径,对公民进行孝的传统美德教育,从而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和睦的家庭关系,只有家庭和睦,才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另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由于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的不同,中国养老大多还要采取家庭养老模式。赡养父母虽然也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但这项义务具有更多的伦理性,其履行更需要道德的自觉,因此,加强孝道教育,能促使儿女履行自己养敬父母的责任,从而较好地解决中国老

龄社会的养老问题,促进社会稳定。

最后,弘扬传统孝道,有利于培养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如果抛弃了传统孝道的政治功能,那么,孝作为人的伦理责任心之源头的和实践道德的首德,这一内在机制在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中并没有改变。确实,人最早接触的人际关系就是与父母的关系,人间的慈爱与呵护首先来自于父母,爱教会爱,人总是在他人的爱中感受爱,体验并形成最初的道德责任感的。因此,爱团体、爱社区、爱民族、爱国家的道德心与责任感,首先都是产生于爱父母的感情中。一个人的初始责任也是对父母的责任。人的道德成长正是把这种责任感不断地扩充、升华而形成了对他人及社会的爱与责任。因此,我们在人的道德发展的青少年时期,一定要重视对其进行孝敬父母的教育。在中国文化中不太强调代际的独立与断裂,因此,我们每个人不管年龄多大,只要父母健在,我们仍然是儿女,不能摆脱孝敬父母的责任。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为人子女的身份,因此,要求每个人孝敬父母实在是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起点。传统中国之所以能把孝泛化,一方面是因为孝的主体是广泛的,另一方面孝作为道德的起点与内在精神即爱与责任也是有进一步扩充、升华的可能性,以至于从孝敬父母中可以升华出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的社会责任感来,如对民族行大孝的意识,如视祖国为父母之邦的意识,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意识,因此,孝道教育实在是培养中国人道德的起点与源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